

建國六十年憶受降

何應欽

為民國六十年九月號東方雜誌作

一、前言

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的一年，也是我們革命建國史上的第二個辛亥年。在這雙十國慶即將來臨的前一個月，又恰值九月九日我個人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在南京接受日軍簽字投降的二十六週年紀念的時候，我們緬懷當年辛亥武昌起義，締造中華民國的成功，與八年艱苦抗戰，終於獲得最後勝利的光榮，而對著今天中共竊據整個大陸，億萬同胞遭受它們摧殘壓迫，而國際姑息主義者却又為它們的笑臉攻勢所迷惑，正在企圖牽引它們進入聯合國的事實，使我們對中共多年來的暴虐措施，與國際姑息主義者的天真幼稚的行為，既不勝其憤慨，而對我們革命先烈犧牲奮鬥的精神，則不僅致其無限的崇敬，也更增強了我們革命建國終必能獲得最後成功的信心。

二、艱難締造、有志竟成

的確，六十年來的中華民國，是在艱苦中誕生，也在艱苦中茁壯，更在艱苦中磨鍊成長的。如果說，六十年前的辛亥武昌起義，是我們革命建國史上成功的第一頁，則二十六年前九九受降，也可以說是為我們革命建國所留下最光榮的史頁。

誰都知道，辛亥武昌起義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是國父領導我們革命先烈，經過十次革命的失敗，拋頭顱，洒熱血，才能喚醒我們民族的靈魂，振奮我們民族的精神，大家一致起來，推翻專制腐敗的清政府，剷

建了中華民國的。記得辛亥武昌起義的前夕，我還在日本東京牛込區的振武學校肄業，這是專為我們中國留學生接受日本軍官教育以前施以特殊訓練的一個陸軍預備學校，當時我們聽到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真是興奮異常，幾乎所有中國學生都準備回國參加革命。後來幾經交涉，我們才以請假的方式，獲准離日返國。我也就這樣到達上海，加入了陳英士先生的滬軍都督府，擔任訓練科的一等科員，以後奉派為江蘇陸軍第七師第三團第一營營長。直到民國二年，才又獲得日本政府的同意，重返振武學校，繼入步長五左聯隊後，升陸軍官校，繼續完成我們的學業。這說明當時我們革命建國運動的開始，是如何的艱難困苦；與我們那一代青年，在那時候，又是如何的熱心於這一運動的初步完成。

民國成立以後的幾十年間，由於我們的建國基礎沒有鞏固，我們革命的敵人到處都是，以致我們的建國工作，首先遭到袁世凱稱帝的破壞，與北洋軍閥所引起割據私鬪的紛擾。經過我們二次革命、雲南起義、護法運動，以至東征、北伐，不知多少次的犧牲奮鬥，才終於統一了我們的國家。可是，早在我們統一還沒有完成的時候，日本軍閥和中共，就蓄意以武力破壞我們革命建國的運動。於是緊接著全國統一而來的，除少數野心份子的不時啓露，都迅即收平外，主要的就是日本軍閥對東北的侵略，和中共在江西建立的蘇維埃政府。這時候，由於我們對外作戰的軍事準備不夠，使我們對日本軍閥的侵略，不得不暫時忍辱含垢，一面爭取國際友人的同情，一面積極充實我們的戰備。至於江西剿共的戰事，經過五次大規模的圍剿，才真正搗毀了中共的老巢，迫使他們經過兩萬五千里的長途逃竄，

最後才盤據在陝北延安的一隅，苟延殘喘。誰知就在我們積極計劃澈底予以消滅的時候，却又發生了張楊劫持統帥的事變。及至這一事變與告解決不久，跟著又發生了蘆溝橋事件。日本軍閥既揮兵直下華北，我們乃被迫不得不起而全面應戰，也就這樣放棄了我們消滅中共的戰爭，掀起了我們長期而艱苦的對日本軍閥的作戰。

這裡，我只要略舉幾項統計數字，就不難獲知在這一長期對日抗戰中我們所遭受損失的嚴重與戰鬥的艱苦。單就軍事方面來說，除海軍由於優勢懸殊，在作戰初期，我們所有艦艇即多遭日軍摧毀或被我自動沈沒以阻塞航道外；陸軍方面，在八年期間，總計與日軍發生大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鬪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戰鬪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一次，我軍傷亡失踪官兵達三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餘人。空軍方面，我們以僅有少數劣勢的飛機，與日本空軍相週旋，在八年期間，總計出動作戰一萬八千五百餘架次，傷亡空軍官兵達四千六百餘人。而日本飛機對我們的空襲，單以後方城市遭日機空襲次數，即達六萬二千九百餘架次，我國平民被炸死傷總數達二十萬九千餘人。這些統計數字，顯示我們在對日抗戰中犧牲的重大，與我們革命奮鬥精神的堅強。也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這種犧牲的成果是豐碩的，是光榮的。我們終於在苦戰八年之後，獲得了輝煌的勝利。

記得民國三十四年的九月九日上午九時，我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接受日本在華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代表簽降的典禮完成後，曾發表廣播說：「敬告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我是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已於本日上午九時，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鬥的結果。東亞與全世界人類和平與繁榮，亦從此開一新的紀元。本人誠懇希望我全國同胞，自省自覺，深切瞭解今日為我國家復興之機會。一致精誠團結，在 蔣主席領導之下，奮發努力，使復興大業，迅速進展。更切盼世界和平，自此永奠其基礎，以進於世界大同之境域。」

可惜的，是我們這一由艱苦奮鬥所獲得的輝煌成果，並沒有為我們帶來革命建國運動最後成功的期望。相反的，却給予中共一個最好的機會，

趁著我們戰後百孔千瘡、百廢待興的時候，利用人們普遍厭戰的心理，藉著蘇俄幫助，在東北劫收的日軍武器與資源，遂使八年來在抗戰中逐漸坐大的中共，終於矇蔽我們的盟友，誘使美國背棄我們，乘勢發動全面的武裝叛亂，將整個大陸和億萬同胞，關進了血腥的鐵幕，這是何等悲慘的事實！

三、不念舊惡、以德報怨

中國與日本兩大民族，同文同種。無論在地理、歷史、文化、經濟上，都具有極悠久深厚的關係。早在民國十三年冬天，我們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東京講演，即曾呼籲日本人民，要與中國國民加強合作。他提出大亞細亞主義，主張中日兩大民族，必須澈底覺悟，密切合作，以為未來亞洲的兩大支柱。當時他這一主張，曾獲得中日兩國不少先知先覺人士的普遍共鳴。而尤為我們的 蔣總統，和我們許多致力於中日親善合作關係的朋友們，所一直奉為圭臬，並為我們唯一努力的目標，因此，儘管我們過去與日本軍閥之間，不幸而發生八年的戰爭，然而，我們對此一中日親善合作的信念與目標，仍然是始終不渝的。

蔣總統對中日親善合作的決心與遠見，最值得今日日本國民感念不忘的：第一是當戰爭進行至民國三十二年的十一月，羅斯福總統在開羅會議中，就日本皇室地位的問題，徵詢 蔣總統的意見。 蔣總統即直率說明，日本起意發動戰爭的，實在是日本軍閥。這一問題，應該由戰後的日本國民，依其自由表明的意志來決定。事實上，早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日共領袖野坂三三，即盛倡廢除天皇制度。民國三十一年羅斯福總統推薦給 蔣總統的美籍顧問拉鐵摩爾，和當時在重慶美國大使館的文生參事與美新處長費正清等，都主張廢除日本天皇。拉鐵摩爾甚至主張，把日本天皇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今天這些主張，已經證實是出於國際共產主義的導演。而 蔣總統洞燭幾先，毅然提出由日本國民自己決定的意見，維護了日本天皇的制度，這對日本戰後國內局勢的安定，影響是十分明顯的。其次是在開羅會議中，羅斯福總統希望中國在戰後軍事佔領日本的任務上，應該擔當主要的角色。而 蔣總統則坦率表示，中國無意擔任這一任務。這

一工作，應由美國來領導執行。因為 蔣總統深知中國如果派遣軍隊佔領日本，則蘇聯亦必將派遣紅軍佔領日本的北海道。其結果，必將使今日的日本，陷於與韓國、越南和德國同樣的命運。因此，在開羅會議對這一問題雖未作最後決定，而在戰後美國派遣軍隊佔領日本的時候，我們始終沒有派遣軍隊參與佔領的工作。這對維護日本領土完整的關係是極為重大的。

自然，最重要的，還是 蔣總統在戰後對日本以德報怨的偉大昭示。

當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第二天， 蔣總統立即對全國廣播說：「我們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贖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復他們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是我們每一個軍民同胞，今天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本著 蔣總統這一偉大的昭示，我個人在受降的措施中，確曾做了一些對日本寬大的處置。在接受日軍投降的第二天，我特別單獨召見日本在華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我坦率的告訴岡村：「今後是中日兩國真正親善提攜的時候了，讓我們來共同努力。」我委派岡村為日本派遣軍連絡部長官，允許日本在華官兵，仍然維持原有的軍隊建制，由岡村擔任命令的轉達，並發還必要的交通通訊工具。這在當時，雖曾遭到同盟國一部份人士的反對，主張應該給他們以普通俘虜的待遇。然而，我却認為唯有這樣，才能夠圓滿達成遣返的目的。至於日本婦女，却又為了顧慮她們的安全，特地將她們集中在一起，優先遣送，以免遭受到意外的侮辱。那時，在我國內地的日本軍民，總數約兩百一十萬人左右。以我們戰後交通工具的缺乏，加以各方還都復員的需要，要將這樣多分散在我國內地的日本軍民，在短期內集中於幾個港口，分別遣送回日本，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我為了執行 蔣總統的決策，乃不顧一切，千方百計，盡力抽調可能的運

輸船隻，終於在十個月內，完成了這一史無前例的遣返工作。特別是在將近結束階段的時候，漢口、長沙等地有一部分待遣的日本僑民，實在沒有船隻可資遣送，而盟軍方面為了配合從上海遣送至日本的舟船計劃，又堅決主張這些日本軍民，由漢口沿江步行東下。我唯恐這些軍民長途跋涉，醫藥困難，死亡必多。加之經過各地的中國人民未必完全洞悉 蔣總統的德意，以他們過去身受日軍的蹂躪，難免不發生對日本軍民報復的行為。因此乃毅然決然，集中平漢、隴海、津浦三路鐵道運輸的力量，將日軍民從漢口經由鄭州、徐州，轉運南京、上海。這種苦心，是唯有當時參加遣返工作的人員，才能深切瞭解的。

戰後，岡村寧次曾在日本發表一篇「徒手官兵」的文字，說明當時他們在被遣返時所受到的待遇。對這些事實，有比較詳盡的記載。其中有一段這樣說：「當遣返之際，無論軍或僑民，都准許除了被蓋之外，各帶行李三十公斤，及僑民一千日元，軍人五百日元的現款。這和從其他國家遣返的人相比較，可以說實在是寬大的處置。當然，在僑民中，也有許多人久居中國，已經建立了經濟基礎。這時，只能帶這一點東西返國，自然是一件悲慘的事。他們這種悲慘的心情，也自然值得同情。不過，我想這些人一旦返抵日本，看到從其他各地區被遣返的人抵達日本港口時的樣子，也許會知道中國採取的處置，是如何的寬大。」「當時我曾屢次被駐日盟軍責難，從中國返日的人行李過多，阻礙登岸後到各地方的運輸，對此我未加理睬，貫徹到底。從這個事實，也可以知道，與其他從南洋各國返日的人相較，從中國返日者的行李，是的確太多了。」他在這篇文章的最後，還強調說：「我從返國以後，一直避免公開發表一切有關國際政治或某一個人的談話。本文的目的，只在傳達戰爭結束時。 蔣總統以下中國官民，對戰敗的日本所表現的好意。並訂正一般錯誤的宣傳，寫出我渴望儘早實現中日真正提攜的誠意！」這段話，可以代表日本國民對我們當年寬大處置的感激。這在我個人每次旅行或經過日本的時候，與日本朋友的接觸，都深深地可以體會得到。最近，許多日本熱心中日親善合作的朋友，在福岡市所舉行感謝我們 蔣總統恩德的大會，更充分表現了日本國民對我們這份感情的滋長。

不過，戰後的日本，由於美國盟邦輔導民主政治的成功，日本全國上下含辛茹苦的努力，與夫韓戰和越戰對日本工業起飛的刺激，使日本今日的發展，確已不僅從廢墟中恢復，並超過了往昔的繁榮，而且已經成為亞洲乃至整個世界民主國家的一份核心力量。可是我們，却在戰後短短的五年間，即遭到整個大陸沈淪的後果。這真是一份令人感慨萬千的對照！回想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的前夕，日本駐華武官喜多誠一見我說：「如果中國不接受廣田三原則，則戰爭將不可避免。」我曾坦率的告訴他：「日本既然要發動侵略，實在不得已，我們決徹底反抗。戰爭的結果，中國與日本，必兩敗俱傷，日本亦絕無好處，終究將使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坐收漁人之利。」當時日本所謂廣田三原則，其內容就是以「共同防共」為主題的。事實告訴我們，日本軍閥的侵略行動，却相反的幫助了共黨，為中共造就了坐大的機會。尤其是戰後中共在東北所劫收關東軍的武器，包括七十萬支步槍，一萬一千挺輕機槍，三千挺重機槍，一千八百門大砲，二千五百門迫擊砲，七百多輛戰車，九百架飛機，和八百棟大型的軍火庫。無疑的，這都成爲了中共在戰後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的資本。拿這些事實看來，誰能說當年日本軍閥對我們的侵略行動，對今日我們所遭致大陸沈淪的悲慘後果，能不負直接或間接的責任嗎？

說到這裡，我要重申我在六年前受降二十週年時所寄望於日本朋友的幾句話：「日本與我們，同爲亞洲民主陣營中的一員，更共同站在保衛亞洲民主自由的前哨。以我們戰後對日本的寬大，和我們今日大陸同胞所蒙受的苦難，種因於當年日本軍閥對我們的侵略來說，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日本在今日我們對抗共產主義侵略的戰爭中，與我們站在一起，並與我們緊密携手，來共同消滅共產主義侵略的威脅。我個人更誠摯的希望日本朋友，不要僅縈懷於過去對我們種種的感激，必須放眼未來的世界前途，以高瞻遠矚的眼光，和實際有效的行動，爲我們、爲亞洲、也爲日本人民自己和後世子孫永恆的幸福，作長遠的打算和努力！」

四、茹苦含辛、精誠合作

八年長期的對日抗戰，在最初的幾年，我們一直是以劣勢的兵力與裝

備，單獨對日本軍閥作戰的。當時，英、美等國家對我們的同情與支援，是極爲有限的。英國甚至在他們國內情況緊急的時候，還爲了討好日本軍閥，封鎖滇緬路的交通，助紂爲虐，使我們海陸對外的交通，都陷於阻斷。美國一直是我們最忠實的朋友，早在民國二十一年初，即已有史汀生「不承認主義」的宣布，給予我們精神上的支援。作戰初期，對我們淞滬戰役的壯烈犧牲和南京撤守，也只以惋惜的語氣，預測我們終必遭致失敗。及至開戰一年以後，看到我們抗戰精神反愈挫愈奮，才由對我們普遍的同情轉而發生尊敬，願予我們實際的援助，並對日本逐漸採行各種經濟制裁的措施，先後廢止美日通商航海條約，限制戰略物資運往日本，凍結日本在美資金等。民國三十年，更通過對我租借法案，派遣軍事顧問團來華，負責裝備及訓練我國新軍。同時成立美國空軍志願隊，在陳納德將軍指揮下，參加我軍作戰。直至太平洋戰事爆發，我們對抗日本軍閥的戰爭，才真正進入與美英等國盟軍并肩共同作戰的階段。

民國三十一年，中國戰區統帥部成立後，當時我們對日抗戰的軍事形勢，更增困難。日軍繼第三次長沙大會戰之後，正積極企圖集中兵力，加強對我們的壓迫，以期及早能解決中國境內的戰事，以便利其抽調部隊，用於南太平洋方面。而我們這時作戰物資極端缺乏，美英等國又正集全力量計劃首先擊敗德國，一切戰略物資的供應，都以歐洲戰場爲優先，可用於中國戰區的，真是寥寥無幾。而我國對外交通，又只有依賴喜馬拉雅山駝峰的一條爲空運補給線，且時遭暴風雪的襲擊，以致每日運輸的物資，僅能供應陳納德將軍所指揮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的需要，其他都無法供應。我們也就在這樣惡劣的情勢下，與優勢裝備的日軍作戰，其艱苦的狀況，真是難於形容的。然而，我們本著 蔣總統的指示，與盟軍的合作，密切無間。首先，當民國三十一年三月，日軍以三個師團的兵力，突入緬甸，此時英軍在馬來亞戰敗之餘，士氣頹喪，戰力脆弱。我軍奉命入緬支援，四月上旬，因英軍放棄重要據點馬格威後，我入緬遠征軍右側背已感受嚴重威脅。而英軍第一師及其戰車營，接着被日軍圍困於仁安羌，情況危殆萬分。我遠征軍奉命不顧一切，進解英軍之圍。經過兩晝夜的苦戰，終於救出英軍軍長史烈蒙將軍以下九千餘人。其後，更掩護英軍統帥亞歷山大將

軍，向印度撤退。這種捨己救人的犧牲精神，在盟軍戰史上，曾寫下光輝的一頁，充分表現了我們與盟邦的精誠合作，曾為美國盟友們所稱巧，而尤其值得像英國那樣「只有永久的利益，沒有永久的友誼」的國家所應該深切反省的！

本來，在盟軍併肩作戰的時候，與友軍合作的誠意，是極重要的成功因素。當時，同盟國家為謀中國戰區軍事的密切配合，由美政府派史迪威將軍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對中國國情不盡瞭解，若干地方又受到中共的矇騙，在中美軍事合作上，曾留下不少令人不愉快的事蹟。研究戰史的朋友，對這些事實，曾有不少的記載和傳說。事實上，史迪威將軍往往以西方人的觀點，來作不切合中國國情的建議，而又固執他的成見。譬如有一次，史氏建議以我駐印軍汽車兵團的駕駛兵和砲兵部隊的觀測兵，撥補當時新二十二師和新三十八師的步兵。這件事，在他們西方人看來，是很平常的。但以我們要訓練一個駕駛兵和觀測兵是並非容易的事，當然對這樣做法，便不能同意，然而這却很難獲得史氏的諒解。不過，我們在許多地方，仍然儘可能的遷就史氏，譬如史氏所堅持反攻緬甸的主張，我們仍部分採納了他的意見，把我們最精銳的部隊，投向緬甸戰場。而且在中緬公路完工後，蔣總統特命名為史迪威公路，以紀念他的功績。凡此，都可見我們在與盟軍併肩作戰的過程中，雖則吃盡了苦頭，仍然咬着牙艱。而這份與盟友精誠合作的精神，是絕不稍受影響的，這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重道義的典型表現。

繼史氏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對我們的國情有十分瞭解，因此和我們的合作也十分圓滿。他在回憶錄第二十章裡，一開始就說明：「我在執行職務時，曾認定我係奉命來改善中美關係。我知道要達成此一使命，則應該以同情而友好的態度去接近。蔣委員長及中國政府。以往美國人那一套高高在上的，盛氣凌人的態度，非改掉不可。」由於他正確的工作態度，就他的觀察所得，在他回憶錄的第十三章裡，記載着：「在盟國方面，中國遠較其他作戰的時間要長，所受的痛苦要深。然而獲自美國的援助，比之英國與蘇俄所接受的龐大物資，幾乎是滄海之一粟。蔣委員長所領導的政府，已證明是最忠實而要求又最少的一個盟邦。」他更說：

「中國自一九三七年以來，即在孤軍作戰，所得到的援助却微不足道。雖然西方國家對中國如此漠視及忽略，中國却仍然掙扎苦撐。中日戰爭之初期，蔣委員長相信若能把握以空間換取時間策略，美國必有一天捲入對日戰爭，中國自可因而獲得救助。但是在珍珠港事變之後，雖然情勢迫使美國應該對日全力作戰，而羅斯福却與邱吉爾走上同一條路，將擊敗德國作我們的最高目標。於是中國的情勢，不僅沒有比戰爭初期好轉，反而由於日本對英美兩國發動攻擊，而使中國戰局益形險惡。由於日本在佔領香港、馬來西亞及緬甸後，乃使補給艱難萬端的中國軍隊供應完全斷絕。……過了幾個星期，我開始認識中國國民政府對日抗戰，具有驚人的剛毅與堅忍。史迪威及他的幾個記者朋友所描述中國不願作戰情形，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法國祇在德軍發動攻擊後六個星期，即告覆亡。但中國在一九四四年，仍然苦撐，那已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第七年了。」由這一位忠實盟友的坦率回憶，可見我們當年作戰是如何的艱辛。而事實上，我們迫使日軍深陷在中國境內的泥足，真的無法自拔。即使在它們南太平洋的形勢已告劣轉的時候，仍不惜傾全力發動對我們的黔桂攻勢，妄圖解決對華戰爭。更可知我們對日的抗戰，實不僅直接給予日軍以相當重大的損傷。同時，也為盟軍在南太平洋的作戰，減少了不少的威脅。顯然，我們在這個戰場上所擔任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

我個人每一回想到當年我們在抗戰的後期，特別是當我擔任中國陸軍總司令的時候，所有美國政府派遣到中國來的將領和官兵，如魏德邁將軍、麥克魯將軍、齊夫斯將軍、歐陽達將軍、米都頓將軍、陳納德將軍等，與我們相處都非常融洽。我們之間的合作，也都精誠無間，尤其是麥克魯將軍與我，朝夕相處，可以說幾乎宛如一人。凡屬重要的事件，我們無不開誠相商，積極進行，極其和諧圓滿。儘管當時由於我們各方面的條件不夠，以致我們合作的成果，未必能達到理想的境地，但我們之間合作無間的精神，總是值得我們驕傲和欣慰的。記得我於民國四十七年赴美，在華盛頓停留幾天的期間，晤見當時已退休的魏德邁將軍，兩人相互擁抱，久久不忍相釋，那一種出自內心的熱情，真可說是無法以文字來形容。這可見我們過去確曾有過一段合作無間的經過，才有這樣的表現。單拿老朋

友三個字來形容，實在是不夠說明我們之間的關係的。

我們由此想到美國與我們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僅在抗戰期間，初期寄予我們同情和援助，後期與我們并肩作戰，是我們的盟邦。其實，自從美國的力量伸展到亞洲地區後，美國政府和人民與我們之間的友情，一直是十分友好的。對我們革命建國的運動，也一直是十分支持的。這些史實，都為我們兩國政府和人民所深知。老羅斯福總統且曾有過這樣的話：「二十世紀是太平洋的時代，太平洋東西兩岸的中、美兩大共和國，是世界上最富於理想主義的兩大民族，同具有敬天愛人、民胞物與的大同思想。」至於中共的問題，美國政府對此並不是沒有瞭解，早在杜魯門總統的戰時對華政策說明中，即曾說過：「中國的共產黨問題，與全球其他各地的政黨問題，迥然不同。當時中國政府所面臨的，並不是一個政治上的少數黨，而是一個盤據著一片領土，統治四分之一的全國人口的政權。……馬歇爾及我本人都不曾被所謂中國共產黨只是土地改革者這種說法所矇蔽過，馬歇爾將軍知道他是在和共產黨打交道，對於共產黨人的目的所在，他也知道得很清楚。……我知道，中國共產黨蓄謀奪取中國政權，已有二十年之久了。」儘管過去馬歇爾在中國的工作，終於宣告失敗；也儘管以後的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仍然不免一再造成若干難於挽救的錯誤，以致在我們看來，美國政府當年對我們在大陸對付共產主義的失敗，不能不負若干道義的責任；更儘管今日美國由於國內外情勢的變化，導致國際姑息主義思想的抬頭，影響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使我們感到更大的失望；然而。我所以回溯這許多事實，在我個人看來，美國總統尼克森最近為了接受中共的邀請，將於明年訪問中國大陸的一篇聲明中所說，美國政府絕不會出賣老朋友的話，究竟如何，雖有待於將來事實的證明。但我却認為，我們在美國歷來交往的朋友中，夠得上是一個老朋友，而且是一個最忠實可靠的老朋友。這一點，美國政府和人民，應該是不難體認得到的；因此，更進一步，我堅決的認為，也誠摯的希望，無論國內外的情勢如何變化，美國無論如何，不應該也不能背棄我們這樣一個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與美國抱着一個共同理想的忠實盟友。

五、結 語

最近，蔣總統在國家安全會議提示「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的精神」一篇講詞中，昭告我們：「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為，決不可以一時之波瀾，遂自毀其壯志。國父更昭示我們：存在之根源，無不在於國家及其國民獨立不撓之精神；又說：須知國家之受損害，及時自能回復，若國家之行動，為人所迫脅而不謀抗拒，則其立國之精神既失，雖有大利，亦何以為。如果今天看到某些國家短視近利、違反理性、蔑視正義，侈言和平而實在葬送和平的作為，吾人即為其所激怒，或為其所沮喪，甚至為其所脅迫，而不能持其志毋暴其氣，那就正是在自毀其壯志。只要大家能夠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堅持國家及國民獨立不撓之精神，亦就是鬪志而不鬪氣，那就沒有經不起的考驗，衝不破的難關，也沒有打不倒的敵人；而這亦就是告訴了大家，形勢是客觀的，成之於人，力量是主觀的，操之在我的道理。」這是何等堅定明確的指示！這不僅對我們全國海內外同胞來說，是一盞引導我們今後致力革命建國運動的明燈。同時，對當前為姑息主義思想所迷惘的國際領袖們來說，也正是一帖適時的清涼劑！

最後，藉着我們受降紀念的今天，我仍願用我過去曾經說過的幾句話，來作我這篇文字的結語：我認為國際間的一切，原來是重視利害關係，很少能講求道義的。我們對國際朋友今日所給予我們的感激與同情，既不必自傲或自滿，對我們的冷漠與背棄，更不必責難或失望，而應該代之以必要的諒解與自勉。特別是我們自己，必須趁着這個機會，重溫我們八年抗戰的歷史。讓我們人人知道，在八年艱苦的抗戰中，我們究竟是怎樣戰勝了日本軍閥的？究竟我們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才換得抗戰勝利的成果？而今我們這一豐碩的史無前例的成果，又為什麼為中共所吞噬？眼前我們的處境，和抗戰時期相比較，又是如何？今日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努力，我們的準備，比起抗戰時期的一切，又是怎樣？我們必須以這些問題的答案，來惕勵自己，督察自己，然後我們才能以這多年來慘痛的經驗，與我們生聚教訓的準備，結合成一股匯洪的反共復國的力量，來重新寫下我們革命建國史上更光輝燦爛的新頁！